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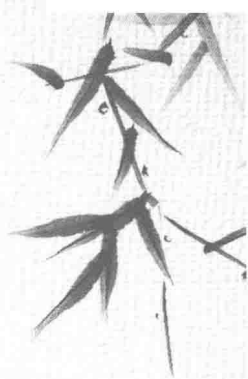
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

张爱军 吴现文 著

CIP

中国电影

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



张爱军 吴现文◎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 / 张爱军, 吴现文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106-04422-0

I. ①文… II. ①张… ②吴…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845 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策 划: 银川当代文学艺术中心图书编著中心

(当代出书网 <http://www.csw66.com>)

特约编辑: 杜 哲 刘 娜 黄 娜 晏 子

封面设计: 清 风

责任校对: 晏 子 黄 娜

责任印制: 庞敬峰

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

张爱军 吴现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422-0/I·1075

定 价: 35.00 元

文本分析向文化研究的转向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发现,即使最彻底的文学批评家也不会接受那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了;事实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学,对不同的人来说,文学意味着不同的事物。有文学批评创造出来的文学,也有独立于批评之外存在的文学(转引自迈克尔·莱恩著《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研究视野的扩大,不是研究方向的转变。纯文学文本已经在大学中文系被过度解读,即使韩寒、郭敬明的作品也已经被经典化。在纯文学被过度解读的时代,扩大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既是专业的需要,也是创新的需求,非文学文本折射出的社会文化价值有时是纯文学无法比拟的。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坚守纯文学阵地固然可敬,在被冷落的非经典文本中寻求学术研究的可能,也需要机缘和勇气。《孙子兵法》主张“避实击虚”,被中文系的博导、硕导、博士、硕士们践踏无数遍的纯文学阵地充满刀光剑影,寻求一条创新之路势在必行。只有在交叉学科的荒凉地带,才有可能隐藏着有价值的矿藏。

说到创新,这是科学界人士喜欢的概念,科学网站每天都有大量文章谈论创新,告诉你应该如何创新,这其实体现了创新能力的匮乏和创新的焦虑。创新应该去“做”而不仅仅去“说”,而且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创新模式。科学界拥护原创,反对跟踪、追赶与模仿,这体现了科学工作者立足于世界前沿的境界和眼光。文学界最能体



现原创性的是文学作品,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不如韩寒创新能力强,因为陈思和的文学研究需要跟踪不同的文本,而韩寒的创作只需要想象。然而学术界并不把小说、诗歌、散文当作科研成果,即使《论语》,在今天也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它首先不是孔子的原创,其次不是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存在艺术创造与据史实录的问题。苏轼是才子,在汴京应试时,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此典故说明法官执法要严谨,而君主待人要宽厚。主考官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苏轼说“何须出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苏轼摆脱历史的束缚,自由表达个人见解,这种治学方法不是一般人能随便使用的。“虚构”历史的还有福柯,曾有史学家询问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描述的重要历史现象“愚人船”,究竟是艺术虚构,还是确有史学依据,福柯不知如何回答。苏轼与福柯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艺术创造与实录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

网络时代虚拟空间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如同占宇宙 95% 的暗物质与暗能量,它存在,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它,甚至无法解释它。它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网络时代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觉到这一切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但是哪儿不对,进行科学分析却很困难。

借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关注科学文化现象是一种尝试,不只是方法的延伸,而且也是文本的延伸。沈睿认为文化研究要求不仅仅把书籍看成是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衣着、举止、娱乐等,无一不是文化。而且语言不仅是文字,它包括生活中的一切,照片、服装、看足球赛等,都可以从话语角度研究(祈寿华等主编《文学》)。同样,不仅单一的纯文学文本能用细读法解读,网络时代的资讯、信

息、图像,非专业作家的文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解读。

文本细读是理解文学形象的重要途径,科学文本分析也有助于理解科学家的形象,这对于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大有裨益。英国科学家斯诺曾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的“斯诺鸿沟”,斯诺说“人文学者经常陷入一种道德陷阱不能自拔,满足于自我欣赏,悲叹人生的荒诞,处于一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而科学家实实在在地进行顽强有效的持久斗争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通过对文学经典的再阅读,不得不承认斯诺的前半句话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科学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也非常严重。对于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本书主要通过对文学家莫言与施一公院士的获奖,反思科学与人文的不同。另外,饶毅的科普著作也为科学文化的反思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英国剑桥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和商人阶层未能崛起有关。本书主要通过青岛商人赵晓光投资文化讲座的慈善活动,浅析了商人与商业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陆游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试”。对科学与商业文化的关注,主要在《孙子兵法与李约瑟难题》一书中,《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与该书在研究领域上稍有交叉但内容没有重复,可以做互文阅读。

由于本书作者知识结构的缺陷,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莫言获奖与“两种文化”的反思	1
乡村少年的诺贝尔之路	1
一、科学与人文的鸿沟	2
二、小我背后的大我	7
三、莫言辞典	19
四、翻译的作用	35
对“种”的反思与不同文化的碰撞	
——《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浅析	39
一、男人,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	41
二、女人,民族命运的载体	47
三、内部基因、外部条件与文化冲突	58
莫言·施一公·饶毅	63
一、戴着镣铐的舞蹈	65
二、公开藐视 内心欣美	71
第二章 科学文化忧思录	76
一、海归的中国梦	78
二、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93



三、创造容忍失败的环境	100
科学松鼠会的商业困惑	108
 第三章 公共领域的文化多样性	115
德馨居茶室与德兰光明慈善	115
一、德馨居茶室与商人的慈善	116
二、周作人、甲骨文与爱国主义	119
三、个人的还是公共的	123
四、德兰根迥仁波切与宗教慈善	125
五、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慈善	128
人工智能与虚拟空间的生命	130
一、虚拟空间的人工智能	133
二、与媒体联姻	140
三、人机合一：自然美还是人工美	155
 第四章 兵学文化的现代应用	170
孙子的将帅观及其现代价值	170
一、将帅的精神品格	170
二、将帅的能力构成	179
三、将帅对势的运用	191
困境与出路	201
一、技术技能人才在传统的地位	202
二、项目教学法的理论源泉	205
三、项目实施的商业文化环境	208

四、项目实施的内部要求	211
五、作为项目的文化	215
第五章 女性文化面面观	221
绣枕、初恋与“女性文学”背后的男性目光	221
一、绣枕：物化的女人	221
二、三姑娘：男性永远的初恋	222
三、女性文学：男权文化的产物	224
女性科学的异化	225
一、女性科学，一个新兴的领域	225
二、麦克林托克的“尖叫”	228
三、当代女性主义的回归与变异	230
女性管理与王熙凤对男权文化的反叛	232
一、不通文墨的天才	233
二、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	237
三、正派社会不羞辱	240
后 记	243

第一章 莫言获奖与“两种文化” 的反思

乡村少年的诺贝尔之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网颇为喧哗与骚动了一阵子。研究信息科学的赵明在科学网输入莫言两个字进行检索，发现从2012年10月11日19时莫言获奖，到2012年10月14日21时为止，短短3天的时间，和莫言获奖有关的博文在科学网居然有3000篇之多！这些文章介绍者有之，反思者有之，它们从不同侧面暴露了科学工作者对文学奖的不同心态，也体现了纠缠不清的科技“诺奖”情结。2015年10月5日，85岁的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科技界“诺奖”的零突破。和莫言获奖时的热闹相比，科技界的反应比较理性，一个期待上百年的荣誉突然降临，带来的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错愕。郑小康甚至认为“诺奖”委员会把奖颁给不是博士、不是院士、不是海归、研究中药的屠呦呦，是对科技界评价体系的冲击。屠呦呦获奖的意义要经过历史沉积才能显示出来，本文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探讨莫言获奖对“两种文化”的冲击。

2013年5月15日莫言获奖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与莫言举行了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对话期间，91岁的杨振宁对莫言连连发问，莫言沉着应对，两人的对话让人想起斯诺“两种文化”的鸿沟。由于学术视野的不同，学科难度的差异，科学人似乎对鸿沟的弥合掌握着主动权；莫言虽然和大多数人文学者一样，对自然科学方面有建树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数理化极其糟糕,研究天文学的梦想只能寄托于来生了。

一个只受过5年基础教育的人何以能获得国际大奖?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密码?已经有无数人从无数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莫言笑说他已经变成一个被众人研究的科学对象,每个人都想给他“动手术”。对于此问题的解答,也许像“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一样,成为困扰科技和文学界的“莫言之谜”。

从科学的角度评价文学,似乎人人能读得懂,说得清,颇有些鸟瞰的意思;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科学,除了像莫言那样佩服得五体投地,本文准备在顶礼膜拜之余,在科学活动的外围进行一下反思。

一、科学与人文的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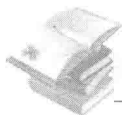
英国科学家斯诺曾访问当时25%的科学家,发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文学家的无知和专业化令人吃惊。他们不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质量或加速度,把科学家当做无知的专家来看待。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陶布,在2001年曾经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很难理解,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以不懂自然科学为荣。”北大医学部谢蜀生认为斯诺(Snow C·P)关于“两种文化”的命题提出已50多年,二者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斯诺鸿沟”不只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在科学与科普之间存在,而且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也存在。

其实这个问题施蛰存先生早就反思过,施蛰存曾提出过“杂文学”的概念,他认为纯文学的道路是越走越窄的,施蛰存把好的历史著作、地理著作、科普著作都称作杂文学。在这个概念下,武际可《力学诗趣》、饶毅《饶议科学》、温景嵩《试答钱学森之问》、杨振宁《曙光集》、丘成桐《数学与人文》、方舟子《爱因斯坦相信上帝吗?》等,都可以算作杂文学。这些杂文学著作不但有严谨的科学性,而且有妙趣横生的文学性,它们是普通读者了解科学的窗口,也是激发普通读者科学兴趣的关键。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尔特曼回忆他的科学之路时说:“12岁时父母为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原子的说明》,里面简约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这份礼

物更加深了我对原子物理学的迷恋。”生物学家保罗·伯格认为他小时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得益于两本书，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部分都读过这两本书，一本是《英雄史密斯》，另一本是《微生物猎人》。前者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医生想解决医学问题，却受到了教授的阻挠，经过斗争，他最终取得了医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一位英雄般的人物。第二本讲述的是科学家研究传染病的故事，年轻人读到这本书很容易被科学所吸引，许多科学家就是读这两本书受到启发和激励成为科学家的^[1]。

科普著作对于普及科学常识，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科普著作非常难写，它不但要求作者有极强的专业能力，而且要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描述专业知识的能力。前者体现了作者的专业水平，后者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根底。诺贝尔物理学奖沃夫冈·凯特勒说科学普及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美国，公众作为纳税人非常想知道他们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得到什么结果。科学普及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大众不会很懂科学研究前沿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发现的冷凝物，你很难用通俗的语言给非专业的人讲清楚，因为它实在太基础了^[2]。科学家不愿意写科普，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像专业论文那样作为评价科学成就的标准。

科学家不愿意写回报率极低的科普，只能让位给小说家去写科幻。在杨振宁和莫言的对话中，杨振宁认为科学没有幻想只有猜想，科学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是没有出路的。善于运用魔幻手法的莫言，则讲述了一个科学幻想的故事，比他更魔幻的同乡蒲松龄，曾经写过一篇上天摘星的小说。实际上也有科学家擅长写科幻故事，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名中学教师，对20世纪初的火箭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了著名的火箭速度公式和多级火箭飞行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能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为了使人们确信火箭可以在太空中飞行，齐奥尔科夫斯基花了20年时间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在地球之外》。他系统完整地描述了宇宙航向的全过程，提到了宇航服、失重状态、登月车等，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设想与现代太空技术完全一样。如果莫言讲述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说，杨振



宁先生该如何回答呢?幻想的科学是有出路还是没有出路?科幻小说重点在科学还是幻想?科幻小说的作者应该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

莫言获奖距离杨振宁先生获奖已经 55 年,在这期间没有任何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大地上获奖,直到 2015 年 10 月才由本土科学家实现科技界“诺奖”零突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海帆发现 1901 年到 1925 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德、英、法等欧洲地区,仅这 3 个国家在上世纪早期就获奖 34 次,可以说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在欧洲。然而从 1951 年到 1999 年,在不到 50 年间,美国人获奖达 170 次,而那 3 个国家只获奖不到 70 次,全球科学中心已完全转到了美国。汤海帆进一步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诺贝尔奖发源地的欧洲丧失了往日智慧的光环呢?难道欧洲人变笨了吗?

这个来自北欧小国的奖项一直困惑着世界各国的臣民,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鲁迅也被其骚扰过。1927 年,鲁迅曾受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青睐,他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是遭到鲁迅的严词拒绝。鲁迅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3]当然,鲁迅拒绝的是提名,不是像哲学家萨特,获得诺贝尔奖后拒绝领奖。后来老舍、沈从文也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最终没有变成现实。鲁迅的拒绝被解读成落后民族清醒的自我意识,这对文学的地位、文学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纵观历史上其他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人获奖往往凝聚全世界的目光,由此带动文学的发展和文化的输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风行一时,和《百年孤独》的获奖有直接关系。

莫言获奖后,科技界的焦虑与日俱增。为了冲击诺贝尔奖,科技界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2013 年 10 月一篇署名盛若蔚的文章《我国将遴选百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透露了科技界的“诺贝尔计划”:推选 100 名具有冲击力的高端人才进军诺贝尔。除了“百人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还有专门针对 35 岁以下青年精英的“2000 人计划”。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才计划是科技界诺奖焦虑的直接表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俞强称看到“诺奖”计划,他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大跃进”,这种“大炼钢铁”的行为在

科学文化界比较风行,各种人才计划愈演愈烈。俞强先生认为“诺奖”体现的是科学探索精神,科学的魅力在于科学发现的不可预测性。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不是“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产物,也不是什么“青椒计划”能够专门培养的。2015年10月5日,85岁的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体现了“诺奖”的不可预测性,屠呦呦不属于任何“人才计划”,不是进军诺贝尔的最具冲击力的高端人才。屠呦呦的获奖,和莫言获奖一样,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层反思。任何侮辱、谩骂甚至诅咒,对于良性科研环境的建立都是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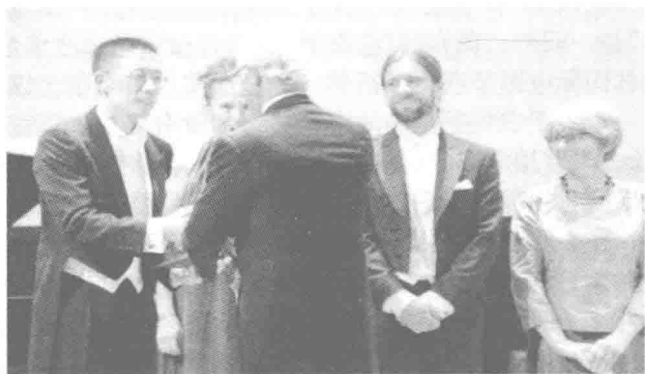
俞强所说的“科学发现的不可预测性”和莫言的“没想到获奖而获奖”是一回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金熊奖。后来张艺谋专门让莫言写一个关于农村题材的故事,莫言却没有成功。莫言后来反思:为什么想着拍电影的时候打动不了导演,而在专心写小说的时候却被导演看中呢?莫言对《红高粱》的反思隐含了他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在2001年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的演讲中,他说如果为获奖而获奖,即使获了奖,这个作家也就完了蛋,没想到得奖却得了奖是另外一回事。对于文学经典亦是如此,经典是作家孤独心灵的产物,轰轰烈烈,标语口号,那是“大炼钢铁”,不是写作。莫言不同时期对于不同文学事件的反思,可以看出他的清醒和冷静,正是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才使他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可能。

2014年3月31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国际上著名的爱明诺夫奖。虽然不是诺贝尔奖,但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是决定诺贝尔化学奖的机构,施一公与瑞典国王的“第二次握手”似乎指日可待。

施一公与瑞典国王第一次握手之后,各种媒体进行过大量报道。施一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因此在实现“诺奖”零突破的前夜,施一公身上集中了很多人的期盼与梦想,媒体的巨大能量把施一公推向了火焰山的顶端,然而这座火山却没有在期待中喷发。屠呦呦的获奖让很多人的期待受挫,这个不是博士、不是院士、不是海归的“三无科学家”,已经处于科研与人生的



边缘,把她置于媒体的中心,似乎不像施一公可以满足人们偷窥的欲望。山雨欲来风满楼,处于“诺奖”零突破前夜的施一公,是善与恶、正与邪、光明与黑暗集中的焦点。施一公获得爱明诺夫奖之后,央视记者在2014年4月2日做了一个小型调查,结果发现不知道施一公和他的研究领域的人超过7成,将近8成。其实早在2010年就有人在互联网做过类似的调查,高三学生的职业理想依次是公务员、律师、医生、记者等,唯独没有科学家。王庭大委员看到这个结果后,又在中小学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科学家排名第七,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



瑞典国王为施一公颁发爱明诺夫奖



瑞典国王为莫言颁发诺贝尔奖

2011年,我在自己所带的班级做了一个小型调查,结果比这还糟,科学家和工人、农民并列最后一名。学生的理由是科学家太苦、太累,付出太多,回报太少,不像企业家能够获得社会应有的尊重,学生的职业理想大部分是企业家。很显然,李约瑟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当时的答案已经不能合理解释今天的现象。

二、小我背后的大我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采访1992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马库斯时,他建议采访他的中国学生高毅勤,他是2001年加州理工大学唯一的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高毅勤博士毕业后想回国效力,联系多家单位,却没有一家愿意接收。高毅勤告诉记者:“很多单位说,我们有的是人才,缺的是资金,你带着钱来我们立刻要你。”马库斯说:“最终能使中国更好发展的是,很多在这儿学习和做研究的学生回到中国,而中国为他们提供相对良好的科研环境。”事隔多年,从网上可以查到高毅勤的信息,他连续读了5年博士,又在加州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做了三年博士后,2009年作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进入北大,被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高毅勤乘着中国人才计划的东风,获得了2001年想不到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各种人才计划给滞留海外的学子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平台。

高毅勤回来了,政府帮助他解决了钱的问题。钱不仅困扰着当年的海归,更困扰着几十年前一直吃不饱的莫言。那个时代,吃不饱的人有很多,但是因为饥饿而写作,把饥饿当做创作的财富,为摆脱饥饿而成为作家的人却不多,莫言在很多文章中讲述过和吃有关的屈辱经历。当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告诉他当作家可以挣很多稿费,而且每天能吃三顿饺子的时候,激发了莫言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作家的渴望。莫言说:“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有多么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

有人说莫言是最善于描写饥饿的作家,饥饿是莫言创作的财富,也是他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莫言讲述饥饿的故事大部分采



用了儿童视角。《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是一个在深秋还光着上身穿着短裤的 10 岁左右的少年，他跟着成年人在公社里劳动，因为饥饿，铁砧子上的红萝卜在他眼中变成了金色。“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大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牛》中的“我”是村里最让人讨厌的 14 岁少年，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博得闲人们的笑声，可以干很多荒唐事。为了吃一碗炒牛蛋子，不顾刚刚被骗的牛的死活，和精明的杜大爷斗智斗勇；因为饿和馋，杜大爷向“我”炫耀过去吃牛肉喝烧酒的时代，“我”趁机攻击他赞美旧社会。但是“我”是善良的，被阉割的大牛双脊生病后，“我”能感受到它的痛苦；双脊死后“我”心里很难过，村长麻叔却既兴奋又激动，他想杀牛剥牛肉吃。最后公社干部把这头死牛宰杀了，结果 300 多人食物中毒。《野骡子》中的“我”是个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我爹和野骡子私奔了，关于他们的谣言最让我反复品味的是三条，每条都和吃肉有关；每当这时，我的眼里就饱含着泪水，他们不可能理解一个男孩对肉的渴望竟然能够强烈到泪如雨下的程度。”《丰乳肥臀》中的“我”是个长不大的老小孩，母亲在外面生吞了粮食，回家后对着清水盆把粮食从喉咙里呕吐出来，然后洗净给“我”吃。大饥荒时期，“我”目睹了炊事员张麻子以食物为诱饵，在树林里强奸七姐的过程。后来七姐因多食了豆饼，腹胀而死。

陈思和说“莫言的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选择一个懵里懵懂的农村小孩”，小说里的各种场景常常“是在一个简单无知又自作聪明的小孩叙述下展开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把这个既“不红、光、亮，也不高、大、全”的小孩称作莫言的“小我”，他们“以卑微古怪的方式，重新定义做人的代价”。他们以孩子的视角颠覆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鞭挞社